

目 录 CONTENTS

本期专题·美丽乡村

- 02 主动筹划 全村协力 美丽乡村建设出成效
- 03 陇南康县沈湾村：一个有文化的美丽乡村
- 04 建平挖掘乡土资源建设美丽乡村
- 05 贵州铜仁政协聚焦农村集中建房 助美丽乡村建设

政坛经纬

- 06 周其仁：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经济纵横

- 09 许小年：这次股市狂潮不知如何收场

文化点击

- 13 公务员在看什么书

八面来风

- 15 刘荒田：混在美国，不过如此

人物长廊

- 17 高僧玄奘：为取经“偷渡”出境 回程抄了近路

历史深处

- 19 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一）

悦读时光

- 封三 王鼎钧：我为什么不喜欢鲁迅的杂文（一）

编者按：美丽乡村长什么样？现在有了一面镜子，那就是国家标准，你照一照就一目了然了。

5月27日，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共同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GB/T 32000-2015)。该标准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要素进行了规范，涉及村庄规划、村庄建设、生态环境等各方面，汇集了财政、环保、住建、农业等部委的相关工作要求，规定了21项量化指标。标准于今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从此，美丽乡村建设将有标可依、有据可考。

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来，各地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有的地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等问题，迫切需要可供借鉴的操作指南。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先发地之一，浙江率先发布《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一个蓝本。

作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美丽乡村”已成热词。建设美丽乡村不只是呼应中央战略的施政亮点，更是为群众谋福祉、为子孙计长远的民心工程；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更应软硬结合、内外兼修，实现外在美与内涵美的统一。立足既有条件，统筹考虑具体村庄的地理位置、基础条件、文化特色、产业发展等因素，精心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守护浸润乡愁的村韵，涵养淳朴向上的民风，做强富民安民的产业，才有持续的原动力。

美丽乡村建设，盐城有基础。这几年，盐城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在农业部启动的“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中，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仰徐村、郭猛镇杨侍村、大丰市大中镇恒北村、东台市梁垛镇临塔村共4个村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美丽乡村建设，盐城有经验。盐城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按照“质量优先、确保进度、注重品质、整村整镇推进”的工作思路，更加突出“连片整治、整体推进”，确保整治一片、完成一片、美化一片，凸显连片整治工作成效，全力推动农村环境面貌实现根本性改观，让农民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幸福，让农村的环境更加生态、更加文明。

盐城是农业大市，为了将盐城建成更多的“美丽乡村”，本期推出“美丽乡村”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主动筹划 全村协力 美丽乡村建设出成效



走进英德市望埠镇桥新村村委会石门楼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宽敞的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并装有崭新漂亮的路灯。沿路进村走一百米左右，右手边有一个篮球场，左边则是整齐划一的停车位。球场附近的草地上还随意分布着几张石桌石椅，俨然一幅美丽的画卷。

然而，就在一年前的今天，这里还是杂草丛生、脏乱不堪。从2014年7月开始，石门楼村通过近4个月的美丽乡村建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望埠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之一，并申报了英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文/图：南方日报记者 邓文燕 特约通讯员 黄振生

主动筹划建设美丽乡村 因地制宜做好规划

桥新村石门楼村民小组位于望埠镇北部，距离镇区5公里，全村现有52户、350人，其中劳动力150人，耕地面积300亩，山地约400亩。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傅日仕介绍，从2008年开始石门楼

村就开始整合土地资源，集约用地，并通过竞标的方式，将旱地、鱼塘、山地统一发包出去，大大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当时村里也是开过会商量的，不管你租多少亩，都按照25元/亩的标准出租，目的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到2014年，村集体年收入大约5万元。”傅日仕说。

2014年上半年，傅日仕和几位村理事会成员先后到石牯塘、西牛等地参观了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感到非常震撼。受此感召，村理事会立即行动，根据本村实际，积极筹划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第一步就是要做好规划，所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因地制宜做好村庄建设的总体规划，再分步实施建设。”傅日仕表示，通过多次与村民召开会议，最后确定的规划设想包括街巷硬底化，建立科学排水排污管网，对新村房屋外墙进行整饰翻新，村前的开阔地修建公园、篮球场、路灯等公共设施，实现人畜分离等等。

“前前后后开了七八次会议吧，都是讨论怎么去做，当然也有个别村民不同意，好在我们村的人历来都比较淳朴和团结，做了几次思想工作后就都认可了。”该村理事会成员傅日红说，大多数村民对于建设美丽乡村都是非常支持的，热情非常高。

村民筹资40余万 齐心协力建成新村

规划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实施，但是最大的问题来了，资金怎么解决？按照规划，筹建村前公园及村庄绿化、美化、硬化、净化、亮化等工程建设，总预算约70万元。“7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我们也挠破了头。”该村村支部书记傅宏初说，最后

陇南康县沈湾村： 一个有文化的美丽乡村

中国甘肃网6月8日讯(通讯员刘宏洲)在与江武公路连接的望关乡沈湾村入口处,一个棕榈、翠竹、鲜花相间的小节点总是留住行人的目光,尤其是通村公路旁用瓦片镶嵌的茶马古道图案,彰显出这里的地域文化。走进村庄,这样的节点还有很多,难怪来过的人都说,沈湾村是一个有文化的美丽乡村。

走在沈湾村的乡间小路上,到处是花红柳绿,爬山虎把路边用鹅卵石砌成的护坡遮挡得若隐若现,树根式桌凳,古城墙围栏,以及石子路上不同

的图案,给人一种处处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走进沈湾村村史馆里,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农耕文化被统一集中起来,耕地用的木犁,度量衡工具木尺、16两木杆秤、装量不同的斗,还有许多已经不多见的农具,各个时期的油灯,一个个老物件记录了这个村庄的变迁。

“在沈湾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没有止步于美丽的称赞,而是不断深挖美的内涵,不拼颜值拼文化,找到了美丽乡村建设又一个切入点。”望关乡党委书记杨志康说。

商议结果是主要由村民理事会组织村民自筹、捐款、捐赠、投工投劳等方式解决。特别是理事会成员和外出经商老板带头捐款、捐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村民纷纷捐款,共筹集资金40余万元,村民投工投劳960人次,当地政府和挂扶单位也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了支持。

“村民捐款基本都是1000元以上的,有些老板还捐了桂花树、水泥、石桌等。我们都有做了登记并在村委会公示。有些人实在没有钱的就出力,可见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傅宏初说,尤其是村民义务投工投劳,由于7-10月份正是气温较高的月份,天气炎热无比,但是村民们都毫无怨言,齐心协力完成了美丽村庄建设。

截至目前,石门楼村已完成了排污排水系统、村庄外墙翻新、街巷硬底化、村前公园、41个停车位及村庄“五化”工程等建设。“下来,我们还将计划在村子两边建立专门的棚厂饲养牲畜,实现人畜分离,还要在村庄前面建一个池塘。”傅宏初表示。

卫生绿化“分包到户”

村庄管理更有序

新村建起来了,石门楼村非常注重做好村庄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日常卫生保洁常态化的管理工作。据了解,根据该村实际,石门楼村制定了卫生保洁、绿化养护“分包到户”的管理制度,做到分包到户、责任到人,主要是将村前公园划分为5幅绿化地,约9-10户人家负责一幅绿化地,要求包干户对所负责的绿化地实行“三包”管理,即包“卫生保洁”、包“不乱堆放”、包“绿化苗木养护”(如除草、施肥、浇水等)。

“我们还特别雇了一名专职保洁员,进行相关村庄环境卫生保洁。在保洁员完成不了那么多任务的情况下,属于哪家哪户管理的绿化地,就要求他去进行卫生保洁和绿化养护。”傅宏初说,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村民卫生保洁意识,也让整个村庄管理更有序。同时,石门楼村还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推动新农村建设上新台阶。



建平挖掘乡土资源建设美丽乡村

6月6日夜幕降临,记者来到建平县喀喇沁镇洼子店村,恍如置身一座小城:宽敞整洁的街道、散发着清香的花木、霓虹闪烁的灯光,广场上传来的时尚动感的音乐、人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70多岁的王大爷说:“村里现在的环境这么好,让我进城都不去啊!”这是该镇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积极转变思维、创新理念,扎实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近年来,建平县委、县政府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形成齐抓共管、高效推进的良好局面。要注重与突出特色相结合,与当前基础条件相结合,与实施的涉农项目相结合,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启动太乙山庄生态旅游产业园建设,建设观光农业庄园。成立了旅游管委会,投资2000万元将喇嘛山、燕长城进行了修复,增大文化吸引力。现在正着手修建度假村,同时,建一处连接喇嘛山和度假村的索道,建占地10亩的牡丹园和芍药园各一处、水果综合加工厂一处、综合性畜牧养殖小区一处。建成后,村民可根据个人意愿到度假村、花果园、养殖场工作,年薪2万元以上。石匠沟将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健康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该县跳出“就农村抓农村、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思维,着力创新美丽乡村工作理念:一是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贯穿美丽乡村建设全过程,充分挖掘生态潜力。小塘镇道虎沟村通过层层递进的“四步”发展规划,从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村屯环境综合整治、发展绿色经济林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探索村级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入手,把村庄建设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明珠。村民们增收致富,除了有耕地产出还有经济果园收入,业余文化活动有场地有设施,郊游览胜有路边风景树和林果区的观光景点,聚会休闲有公益场所“明德园”。二是特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有建平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全县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性工作。八家农场先后获“省级文明村镇标兵”、“省级生态镇”等荣誉称号,成为全县乃至全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排头兵。

该农场采取“抓点、连线、凸重”的工作方式,形成了“六点一线”立体模式化的总体布局。“六点”就是以六个文化广场建设为基点打造农村文化示范广场。“一线”就是以打造宣传一条街建设为主线加强宣传阵地建设。

为了拓展美丽乡村建设外延,丰富美丽乡村内涵,该农场还组织开展“讲文明,重礼仪”、“创先争优当先锋、立足岗位比作为”、“道德模范”、“敬老孝亲之星”评比等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经常组织开展农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农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集聚发展理念。坚持工业拉动、产业化推动、旅游带动的发展思路,推动农业生产要素、优势产业向美丽乡村集聚,农民增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烧锅营子乡石匠沟村充分利用该地人文及自然风光开发休闲观光及度假旅游业。(01506011 中国日报 贡兴媛/禄军 张旭 摄)



“隔山喊得应，走路要半天”，这是贵州省铜仁市绝大多数村落的真实写照。铜仁市地处武陵山腹地，山高谷深、路险坡陡，全市近300万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散居于深山区、石山区。搬出山沟，走出贫困，改善居住环境，是这300万农村人最急切的期盼。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乡村；乡村美不美，房子最核心。2013年，铜仁市采取“变散为聚”的方式，率先在沿河自治县7个乡镇实施了13个农村集中建房试点工程，集中建房1090户，搬迁入住998户，转移农村人口4300余人，取得较好成效。如何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关系，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确保全市农村集中建房工作全面推开，一时成为党委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牵动着政协人的心。

2014年4月，铜仁市政协成立“沿河县农村集中建房”课题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延伸考察等方式方法，对沿河县农村集中建房开展了专项调研。2014年9月，贵州铜仁市政协主席会议视察团，对全市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视察。在调研、视察的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重点围绕“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民生怎么办、建好怎么管”

四道难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工程推进进度、努力破解资金“瓶颈”、认真解决移民长远生计、切实加强后续管理服务、尽快理顺管理体制五个方面的意见建议，实现每个农村集中建房点“功能城镇化、农村现代化”，有产业支撑，有文化内涵，促进美丽乡村向人文乡村、魅力乡村转型升级，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报告送呈市委市政府后，市委书记对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对报告加按语转发各区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认真吸纳。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专门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对政协视察报告中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并于2015年1月和5月，分别召开铜仁市农村集中建房工作调度会议和全市农村集中建房现场观摩会。明确提出将抓住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的机遇，规划投入资金46.3亿元在全市9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91个村（社区）建成100个农村集中建房点，并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集中打造500个农村集中建房点，鼓励农村集中建房5万户以上，转移农村人口20万人以上”的目标，让更多深居山区的群众能搬出大山，改善人居环境，切实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中国网 铜仁市政协：李科良 邹志勇）

周其仁：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息。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

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

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

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

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地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凤凰博报 周其仁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小年： 这次股市狂潮不知如何收场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桑坦德银行经济学与金融学教席教授

许小年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许教授是2005年度和2006年度中欧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也是2010年中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发股票就能保增长吗？大家现在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全民盛筵中，根本性的问题被喧嚣的泡沫掩盖了。到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国家的转型、企业的转型，有可能对很多企业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许小年：泡沫破灭后再谈转型就晚了 现在不创新，增长就维持不下去

过去200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总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创新，在技术方面不断突破，从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的发明，到后来的铁路、电力、内燃机、计算机、核能，一直到今天的移动技术、互联网技术都是拜创新所赐。

从微观的层面来说，无数发明家、企业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制度环境，在创新过程中，不仅为自己积累了财富，也为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创新这个课题？照我的理解，是因为依靠传统的生长方式，已经难以维持高速增长了，必须要靠

创新，要靠效率。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间，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效率在提高，速度在放缓。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商业模式、生产组织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增加资源的投入。所以在过去十几年间，我们看到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到现在我认为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要改变技术，改变经济体制，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就是在技术上、制度上进行全面创新，才能够用现有资源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关于创新，我个人的理解，它并不仅仅是技术、产品的创新，实际上还包含了很重要的制度创新的内容。这个制度创新的内容既包含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又包含企业微观层面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发展及时改变，我们又会像过去十几年那样，国家依靠投资驱动，企业依靠资源投入来维持企业发展，宏观、微观层面上都是同样的模式。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这个增长就维持不下去？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你再追加资源，增长速度也会放慢。从宏观层面来讲，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季度，无论是生产的角度还是消费的角度，发电量、企业的利润等等这些经济指标，都是向下的。这些都表明传统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强弩之末，都在放慢。

发股票可以创造财富吗？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

在增速放慢的情况下，本届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也就是“新常态”。“新常态”是什么，各个方面

的解释不一样。我个人理解的“新常态”有三点：第一、我们不再以过高GDP的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第二、我们不再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过高的GDP增长。第三、要依靠改革和创新来创造新的红利，来维持经济增长。

我认为这三点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新常态下旧思维在回潮。当经济数字不断低于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旧思维又回来了。这个旧思维回来体现在什么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好像银根正在放松，似乎政府又在花钱投资，又在拉这个内需那个外需。过去十几年间旧常态下的惯常做法又回来了。这样的做法在过去没有解决问题，在今后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发钞票不能保增长，发股票就能保增长吗？大家现在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你跟他谈什么都没用，因为他一天到晚想着的都是今天股票又涨了多少。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全民盛宴中，根本性的问题被喧嚣的泡沫掩盖了。也许到泡沫破灭之后，我们才会去谈创新，现在大家都没有心思。

发股票能保增长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股市当中融到的资金是否进入到企业了呢？股票的繁荣是否降低了融资成本？这些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思考。等到破灭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国家的转型、企业的转型。但是很遗憾的是，有可能那个时候对很多企业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我不反对各位去炒股票，但是同时要思考企业如何转型。股票市场的繁荣，说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中欧教给大家的是什么？不会教市场上流行的那些胡说八道，我们都知道，股本资金的成本远远高于债务资金的成本。我只挑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极其荒谬的说法来说明一下这个说法的有害性。

一个说法是说我们用股市融资，有效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因为很多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或者说贷款利率非常高，因此就上了股市。但是我们都知，最基本的公司财务的原理是什么？是股本资金的成本显著高于债务资金成本。现在怎么搞成股市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呢？

股市上圈的钱成本更高，成本要远远高于银行的成本。之所以很多企业感觉股市上资金成本低，是因为我们的股民不懂投资，就冲进了股票市场。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要比债务资金的融资成本高7-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在银行可以拿5%-6%成本的贷款，你在股市上融资，股民要求12%-13%，否则股民不干，简单来说，因为股民承担了比债权人更高的风险。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而现在我们就是违反了这样的基本常识。

有人说，教授你学的是西方经济学，我们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科学的话，难道科学还分东西方吗？你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资金成本的概念完全颠倒了，你以为从股民那里圈钱可以是零成本，不用给股民回报，那么这个股市将来的成本是谁来承担的？当然是股民。表现形式是什么？表现形式是当股价跌下来的时候，股民损失惨重。企业已经圈到了钱，但是股民将是损失惨重。这样一个格局，参与泡沫的人、制造泡沫的人可以不考虑，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不得不考虑，我们将来怎么收场？

财富不是这样创造的。人类历史上200年间，财富创造不是靠股票市场的泡沫创造的。中央银行发钞票，一分钱财富都创造不出来，在股市上印股票，也一分钱财富都创造不出来。那么财富到底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个人、企业、政府要问一下自己，这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

◇许小年：泡沫破灭后再谈转型就晚了

企业转型最大的障碍在于习惯性思维

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思考中国经济到今天，离开了创新，离开了技术进步，我们无法再保持企业的发展，无法保持国家经济的增长。因此现在要认真思考转型和创新的问题。泡沫、虚假繁荣终究会过去。最后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今天在股市上赚多少钱，而是能不能比其他企业更早、更快实现公司的转型。

转型创新讲了很多年，认真在做的不多，转型成

功的更加稀少。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微观层面上,为什么中国企业转型如此困难? 中国企业从制造转向创新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我感觉到转型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转型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营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从宏观层面角度来说,国家经济的转型困难、障碍也在于多年形成的习惯性思维。

企业过去的成功大多是依靠单纯的扩张规模,而不是依靠研发或者是创新实现企业的发展。我们企业的成功模式叫做低成本扩张,利用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环境的低成本,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抢占市场,实现企业的发展。这在过去是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未来的辉煌。为什么? 因为低成本不再。在中国搞企业,所有过去那些我们认为永远是低成本的要素都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上升,特别是环境成本在上升。

第二,过去低成本扩张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市场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而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恐怕找不到市场。

我们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无法保证企业未来的成功。传统的商业模式当中有一些要素条件,比如说在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中,良好的政府关系,敏锐的市场嗅觉,灵活的市场经营,严格的成本控制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已经不是成功的关键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今后不再适用了,必须要做出改变。你要是不能做出改变,可能会被市场淘汰,这是第一



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我称之为过去的成功。

机会主义心理妨碍转型

第二大障碍是机会主义心理。中国人就是机会主义的民族,我们的企业也不乏机会主义的行为,没有搞清楚做企业到底是做什么。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是找准“风口”,只要找准风口猪都可以飞上天,这是中国企业界机会主义心理非常典型的表现。有一些同学和校友问我对这句话怎么看? 我说你把自己降到猪的水平,我和你也无话可说了。

做企业不是找“风口”,如果说你认为做企业就是找风口,那就把自己等同于农民了。连今天的农民都不会看天吃饭了,你找“风口”不就是看天吃饭吗? 一个好的农业企业是要保证旱涝保收的,一个好的企业并不是要看准风口,而是无论是顺风还是逆风都可以前行。马云[微博]说,如果说风停了怎么办? 我们要做的是在逆风情况下,一样可以行船。

在做企业方面,我看到大量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的情况下,经常有人问我,教授,你看现在转哪一个行业比较好? 转型不是转行,现在房地产不行了,互联网好,就一窝蜂地杀入互联网。你有互联网行业的竞争优势吗? 这都是找风口的成果。看到互联网企业成就了阿里、腾讯等几家大公司,大家就都杀进去,而不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进入互联网的优势。这种机会主义心理是阻碍我们企业转型的第二大障碍。

人无个性,产品就没有特性

第三大障碍和机会主义心理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缺乏个性。人无个性,产品就没有特性,你要想在今天的市场上竞争,拿出跟苹果一样的产品来已经不行了,你必须要拿出和苹果手机不一样的产品。你要进行的是差异化的竞争,而不是同质化的竞争。同质化的竞争对于市场上的竞争者来说,都是没有出路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彼此侵蚀对方的市场份额,用降低价格来获得对方的市场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利润率越来越薄,到最后无利可图。

为什么市场上都是同质化的产品? 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个性,看上去都一样。他们的思维逻辑、



商业模式都一样。我非常喜欢问企业一个问题，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你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上成功到今天？多少人都告诉我，最重要的竞争力是资源整合能力。我说资源整合能力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你和政府、银行关系好吗？不就是你商业界有几个朋友吗？如果说大家都这么说的话，那就不是竞争优势了。

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我看不到发自内心的主观成就感。我看到的都是他们如何用社会上客观一致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所谓的成功就是看你买卖做得多大，看你资产有多少，看你的市值多大，看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这个标准对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一致的。

我很少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是为了实现一个愿望而做一件事。几年前，我到硅谷去拜访脸书，碰到了扎克伯格，那个时候他才 20 多岁。问他，你为什么想起做脸书。他说做这个事特别酷。我说酷在什么地方呢？他说酷在你可以把全世界 6 亿人放在一个平台上交流。

中国企业家很少因为一件事特别酷而经营企业的。他一定是先问，我能赚多少钱。他没有自己的主观成就感，没有自己的内心价值。所以你看，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谈房地产，现在不行了，房地产退烧了。前一段时间你要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干一个基金。现在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谈互联网。一问你干什么呢？我干一平台。为什么总是这

样一窝蜂呢？

由于他自己没有独立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他用市场上的客观标准来衡量自己，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又非常容易被市场上的所谓潮流裹挟，无法站稳脚跟。因为他太多面向外界，太少问自己的内心；太多是听别人怎么想的，太少去自己思考问题。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

短期经济问题我研究得太少了，我对短期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和理论，但是也不否认他是历史上仅次于亚当·斯密的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为什么关注短期，因为从长期来看都会死掉。”这是非常哲学的回答。

至于说到我是悲观主义者，这其实是有一点误解。我一直是采取批判的方式，这个批判现在被说成是负能量，我首先反对负能量正能量这个说法，如果电池只有正极没有负极就没有任何能量，电池能量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负极。

批判不等于悲观、否定。批判这个词语传到中国，翻译不是很准确，德文当中的批判既有批评的含义，又有分析的意思，其实更多的是偏重于分析，而不是批评和否定。我想我给人造成这种印象，那是因为中国的语境中对批判的理解，似乎是偏重于否定。

如果我悲观，我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我之所以留在这里，因为我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中国经济是有前途的，其实我们做得不算差，我只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你把这种对于做得更好的希望理解成悲观，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误解。

改革开放 30 多年，取得的成就，我在任何场合都是充分肯定的，我只是说我们可以做得再好一些，同时在 30 多年经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是在提醒大家关注这些被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长期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2015 年 06 月 09 日 08:34 作者:中欧视角(52))



公务员在看什么书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的国家行政学院,第十二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一堂讨论课上,课桌上放着一本学员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从受访者的读书种类看,文史类图书居多。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类图书,各年龄段公务员都爱看。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许多政府机构都会定期购买图书供员工阅读,其中不少是领导人著作。2015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在厦门大学考察。他专程到访“厦大时光”书店,并对在此购书的同学说,“世界读书日虽然只有一天,但我们应该天天读书,这种好习惯会让我们终身受益。”读书一直深受中国领导人重视。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言,“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个月之后,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又强调:领导干部“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当读书已成为领导人的生活方式时,普通公务员是否已养成读书习惯?他们平日里在读什么书?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全国各级党政机构24位公务员,年龄跨度从20到60岁,以详细了解他们过去一年间的读书状况。“很难有闲心看书”24位受访者中,学历以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为主,只有两个例外。有23人都在过去一年内读过至少一本以

上书籍。一位大专学历的巡特警大队长一年内读了一两本党建书,三四本警务实战书,“此外还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古代战争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只有华东某省会城市检察院一位处长全年读书量是“0”,理由是“工作太忙”。读书数量最多的是50岁博士,一年读了超过三十本书,包括十多本教育学专著,十多本党建、政策类书籍和会议学习资料,以及少量闲书。除此之外,他自己还写了三本专著。一位25岁的山东年轻公务员一年读了21本书。作为一名山东大学毕业生,她有常人不多见的阅读习惯,“我每天看书时间有四五个小时,通常都是自己买的纸质书,平时也会带kindle(电子书阅读设备)出门。”从采访情况看,电子书成为年轻人读书时的首选。刚在检察院工作两年的女生赵冉(化名)说,她已经不买纸质书了,“都是用kindle看。去年读过的书包括《安全体系中的人性漏洞》、《汉武帝传》、《盗墓笔记》、《侦探小说集》、《小说嫡谋》五本。”辽宁一位年届四十的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一年工作太累,活儿都干不过来,“最累的是公诉、批捕、职务犯罪侦查几个部门,神经绷得那么紧,很难有闲心看书”。不过,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随时随地阅读成为可能。“我前段时间用手机上的App听了齐邦媛写的《巨流河》。”上述检察官说,听书时间也得挤出来,

本文观点来源于许小年教授在6月5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互联创新,自主创业”系列论坛以及6月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班委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管理人员的非营利性高等学府。

“要么是在上班路上，要么是晚上回家带孩子时候听”。“单位有时会发一些书”从受访者的读书种类看，文史类图书居多。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类图书，各年龄段公务员都很爱看。像上述25岁山东公务员，一年中读的21本书里，包括《红顶商人胡雪岩》、《苏东坡传》、《朱元璋传》、《张居正大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李鸿章传》等多本历史人物传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推荐的《大清相国》影响极广，四位受访者都表示读过此书。天津一位公务员还发现，单位同事读的最多的就是这本书，人社部一位处长也透露，“开会间歇时，看到好几个人拿着《大清相国》看。”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许多政府机构都会定期购买图书供员工阅读，其中不少是领导人著作。南方周末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购买频率较高，几乎所有单位购置的图书都包括这两本。浙江一位政府办科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单位有流动书吧，定期购买书籍，大家可以借阅。”这位科长曾经从书吧专门借来《之江新语》看，“一是写材料需要，再就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要求，还有就是课题调研需要”。他还透露，书吧里和习近平有关的书基本都有，还有《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等，“我看过一本朱镕基的书，感觉他讲了一些大实话”。“除了习近平的著作，单位还会下发规范司法行为的图书。”前文提到的年轻女检察官赵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书看过之后要写心得体会，A4纸写三页，两千字左右。不过我们不会真看这些书，觉得会很枯燥。”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副处级干部观察，市面上很多政治意味浓厚的图书往往卖给党政机构。在他看来，如果真想学习政治动态、术语和理念，看《人民日报》比读那些书好。一些基层司法单位在搞专项活动时，都会成立专项小组并给员工发书，比如司法改革专项工作小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小组等等。“看完书后都要写心得体会，我们都是直接抄单位印好的资料，资料则是各种领导讲话和文件的集合。”一位基层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法改革那

次，我们写完让省院来检查的人看了一下就发下来了。”“单位有时会发一些书，但没人看。”江苏一位副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不是小朋友，靠教育约束一名干部远远不够，要靠严格的制度和道德。”中央八项规定之下，一些政府部门也不再发放图书卡。江苏一位处级干部透露，“去年我们单位跟新华书店合作，他们列了个书单，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600块钱书，最后由单位埋单。”作为一名外事干部，这位江苏处级干部透露，单位在买书方面渠道很多，他刚买了些英语工具书，“现在什么都不能发了，给大家点精神食粮也不错”。“看书主要在于心态”如果完全出于自愿，公务员喜欢读书的理由是什么？由于身处不同领域党政机构，公务员若想持续提高业务能力，持续阅读专业图书必不可少。湖南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副科级干部，过去一年花了很多时间看专业书。在她看来，读书与工作及个人专业成长相关，“所以要毫不懈怠地学习”。上述辽宁某市检察院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对执法程序要求愈发严格，绝对不能出瑕疵，“所以平时我们必须把刑法、《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放在身边，没事就拿出来翻翻。”北京某区公务员小丽（化名），一年来为鼓励自己读书，经常在微博上发布看书进度。2015年3月，她发布的当月书目包括《平凡的世界》、《围城》、《金融的解释》等，她还说：“3月阅读量较少，健身两周参加了区里五公里长跑……”“读书对公务员肯定是必要的，不然如何跟上形势呢？”上述拥有博士学位的处级干部认为，“读书也是自我充实提高的很好方式。”上述年届40岁的辽宁检察官记得，大学时读过林语堂不少散文，但没怎么看过他的小说。最近，他把林的小说《京华烟云》找来看，翻完之后又开始看冯梦龙的《初刻拍案惊奇》，不过，“看了两章看不动了，他讲故事还是有点说教，都是因果报应。”这位检察官早年主修国际关系，如今他已经很少触及此类书籍，也很少关心时事。“我的目标是干好工作，办的案件没有瑕疵，没冤枉好人也没让坏人跑掉。”（5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斌实习生李岸东高音子）

刘荒田：混在美国，不过如此



《旧金山人海》

旧金山是天下闻名的旅游城市，每年游客上千万，但本市居民才 70 多万。我在这里生活了 30 多年，如果依然以“人生地疏”自命，便失诸矫情。然而，我一直为这样的事实纳闷：在街上难得碰上熟人。

人海啊人海！注视我吧，哪怕是恶意，也比埋头于手机好！我要距离很远便毫不迟疑地高叫我名字的嗓门，使劲地拍我肩膀的粗豪的问候，毫不犹豫地伸向我的暖暖的手，冷不防地拥抱我的庞大身躯。一句话，我渴望遇到熟人。

不是绝对没有巧遇。有一次，在巴士靠窗的位置，我埋头读报。有人在外头敲玻璃，叫我的名字。我抬头看，秃顶的老白人，并不认识，然而为何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我是荣！”他为自己的忘性生气，声调提高。哦，想起来了，我当年在意大利餐馆的同事。连忙回应，问好。可惜红灯换为绿灯，巴士开行。他挥手告别，蹒跚走上人行道。他的人生断片在我脑际次第闪过：20 岁和高中的同学结婚，数年后老婆和人私奔，他独力抚养女儿。一次婚姻之后不敢再次涉入，但猎艳成癖。“我在

渔人码头（旧金山海滨的著名风景区）的餐馆‘奥罗拉图’当领班那阵，年轻的日本女游客独自来用餐，边吃牛排边用半咸不淡的英语和我闲聊，告诉我她是自助游，问哪里好玩。我说明天正好休息，当你的导游怎么样？（其实是上班日，然而机不可失，请假就是了），第二天一早，开车去旅馆接上她，游玩整天，夜里做爱。这样的露水情，短的一天，长的一两个星期，一年至少 10 来宗。”他在工余的“咖啡时间”向我吹“当年”，为无坚不摧的性感而顾盼自雄。时隔 15 年，光阴把他改造得真够彻底。到今年，荣该满 72 岁，还在人世吗？活得还好吗？

还有一次，在市场街一个候车站，遇到韩国女人素子。30 多年前她和我在一家夏威夷风味餐馆一起干活。彼此马上认出来，叫得出名字。上车以后，聊了一路。我知道她出身于汉城的贫寒人家，高中刚刚毕业那年，在美军基地的咖啡店打工，被一个姓华盛顿的美军黑人士官看上，和她结婚，把她带到旧金山的猎人角定居，生下三个黑檀木般的儿女。我和她谈当年同事们的去向，谈她的女儿和儿子，谈现在的工作。她以嘴没遮拦著名，从下城到海滨的“悬崖酒屋”一程 40 分钟，两人聊得十分投机。那一次，离开共事的 80 年代已 13 年。后来，在“悬崖酒屋”，我作为顾客，她作为侍应生，又见了两次。每次的“礼节性交谈”，都少见地坦诚。她永远是万事足的模样，然而，我晓得她的深层奥秘。她的黑人丈夫，退伍回国后以开长途运货大卡车为活，结婚不久便养了小三。她明明知道，也不点穿，只求每月准时拿到赡养费。她 40 岁那年，深夜下班，在回家路上，被 17 岁的少年胁迫

到街角，强奸了。她报了案，并去医院检查了身体。次日，若无其事地上班去。她的大女儿，14岁起就乱交男朋友。她难以管教，便监督她每次出门约会前在手袋放上避孕套。这些，是素子的闺蜜告诉我的。如今，素子也是龙钟之人了。如果和她邂逅在电车上，一定像过去那般惊喜。她圆滚滚的脸，绽开坦然的微笑，和我谈她的孙儿女，谈她爱吹的“尺八”。我一定要向她打听约瑟芬的下落。约瑟芬、素子和我当年共事，她俩是最要好的搭档。向我把素子的隐秘和盘托出的，正是这位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女孩。

午后，我在市内的地下车站，登上从海滨总站开出的N线电车。电车隆隆开行，进入日落区。乘客下去大半。举目之际，无亲人，无熟人，无朋友。忽然，眼前的椅子上坐下一位中国人。哈，眼熟得很！想起来了，15年前及更早，此公是旧金山公车系统的名人，他彼时尚在血气犹刚的中年，可能是在下城一家俱乐部的餐厅当服务生的，带广东口音的英语颇流利。我见识此公的厉害，是在下城的地下车站，我在等车，他也是。他个子瘦小，对此怀着过分的自卑和由此反弹而成的傲气，天晓得他何以对全市公车系统的运作了如指掌，又总是那么多牢骚。车晚点，他在站台是指着液晶显示屏

骂，车来得太密太疏，他对着值班的人骂，上了车，直趋车头部位，对驾驶员骂。我多次在围观人群中看热闹，开头是佩服，后来是厌腻。因为他吵起来，司机为了向他解释，便把车停下。使得所有乘客都不耐烦。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他老了，松弛的皮肤，在下巴下方晃荡。腰驼腿弯，落座时，把一袋从华人超市采购的货物摔在地板上，不胜重负的模样，教我何等怀念他当年戟指牛高马大的洋人当孙子来训斥的气势。他在说话，声音低沉，是不是还在骂公车晚点，抱怨司机关车门太快？听清了，是嘟囔白菜涨价，今天大便不畅。我到现在才悟出，从前他爱骂人，未必是见义勇为，而是爱炫耀，憋不住话。

我比“话痨”早一站下车。天空瓦蓝，毫不以人间为意。想起一则关于纽约的描写：“那里，每天有250人死去。同时，人们兴冲冲地搬进空下来的公寓——读早报，第29页，刊登逝者的头像。第31页，则是订婚者的玉照。第1页，有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的照片，他们纵情声色，赶紧享用进入第29页之前的岁月。”人海，和目力所及的太平洋的波涛一般，怎么翻卷，都是那么一回事。

◎刘荒田，作家，著有《刘荒田美国笔记》等。

（南方都市报[微博]刘荒田2015-06-10）





高僧玄奘： 为取经“偷渡”出境 回程抄了近路

核心提示：《西游记》中，玄奘出发前唐太宗李世民亲自送行，并有两人结拜之举，故而书中称其为“御弟”

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初唐时期国家尚未完全安定，边界地区尤其不稳，国人出境受到严格限制。玄奘几次申请“通关文牒”都未获批准。贞观三年（629年），长安大灾，官府允许百姓“随丰就食”，也即到有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玄奘就混在灾民的队伍中，出长安，过天水，到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玄奘雕像 资料图 如果没有《西游记》，“唐僧取经”应该不可能成为中国几乎人人知晓的故事。小说里的妖魔鬼怪在现实当中的确是没有的，但当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传奇色彩和艰苦程度较之小说中不但并无逊色，可能犹有过之。玄奘西行五万余里，历时17年，行经当时的110个国家。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学家，他的西行也是借助了当时已经开辟的路线，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仍然是今人认识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参考文献。为西行取经“偷渡”出境在《西游记》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刚刚出生的他也差点遭灭口，多亏母亲偷偷将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后来的一代高僧。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玄奘俗名姓陈，据说为东汉名臣陈口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

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他有三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玄奘年少聪慧，也很早就闻名乡里。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时是中国由繁荣的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过渡时期。他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歧义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国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晋代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写的《佛国记》的巨大影响，激发了他的决心。《西游记》中，玄奘出发前唐太宗李世民亲自送行，并有两人结拜之举，故而书中称其为“御弟”。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初唐时期国家尚未完全安定，边界地区尤其不稳，国人出境受到严格限制。玄奘几次申请“通关文牒”都未获批准。贞观三年（629年），长安大灾，官府允许百姓“随丰就食”，也即到有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玄奘就混在灾民的队伍中，出长安，过天水，到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军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几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凉州都督李大亮严格执行边境管理制度，派人将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凉州为僧俗讲解佛法，影响甚大。听众中有当时的河西佛教领袖、凉州慧威法师，他有感于玄奘的决心和宏愿，遂密派两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关，到达今甘肃安西县东。此时凉州都督的飞骑也赶到了，让瓜州刺史李昌拦截玄奘。但瓜州刺史

李昌崇信佛教，带着公文，到玄奘住处当面将之撕毁，并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出玉门关的情况，又资助了一匹白马。一个月后，玄奘乘着白马，独自踏上西行之路。17年后，玄奘返国再次经过凉州时，受到的则是“国礼”的待遇。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师。虽是世外高人，但久别重逢，想必也难免唏嘘。而他抵达长安之后，也终于获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极大促进了中外交通的开拓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至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按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介永强的说法，佛教传入之初，东汉末年即有外国僧人来华译经。隋唐时期，佛法经像盛于中国，可查的唐代外来高僧就多达五六十人。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为曹魏时期的朱士行。他当时抵达了西域的于阗。到了东晋南朝之际，法显的西行最为著名。他从长安出发，经过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印度。介永强指出：“有唐一代，中国僧人掀起西行求法运动的新高潮，西行人数之多，游历地区之广，空前绝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师。”介永强认为：“中古时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涨洪波，‘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着其先鞭，导夫先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线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其功绩，除了商人，无出缙流沙门之右者。”玄奘西行诞生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者记述了玄奘西行亲身经历的110个以及传闻听说的28个城邦、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其中对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镇都邑、道路关隘的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时比定地名的指针。后者则按玄奘经行的路线记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陆路交通路线的脉络。加上之前的《法显传》、《宋云行

纪》，几部著作在时间上连续性的记载，对于后世比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国虽然关于玄奘西行的线路仍有很多地段难以确凿考证，但大的路线还是可以勾勒出来的。据介永强的考证，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线路为：从长安出发，经陇山古道，历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后，渡莫贺延碛，到伊吾，至高昌，从高昌继续西行，至“阿耆尼国……西南行……至屈支国……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怛逻私即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玄奘从此出发又经过赭时（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国（即撒马尔罕）、羯霜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东南方向渡阿姆河，经吐火罗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着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西行，然后在西域境内依丝路中段中道，最后循着路西段北道前行。贞观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国，他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经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进入吐火罗国故地，再穿过瓦罕走廊达摩悉铁帝国（瓦罕之南）、东行至波谜罗川（即瓦罕河谷）越过葱岭，至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但未从丝路中段西域南道东行，而是经乌铄国（今新疆莎车），绕道口沙国（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到达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经尼壤（今新疆民丰）、折摩驮那国（今新疆且末）、纳缚波故国（今新疆若羌），到达罗布泊地区，再到敦煌，沿丝路东段南道，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长安。

（2015年05月15日09:51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卜松竹）



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一）

1975年年初至1976年年初，胡乔木因邓小平的关照曾有过短暂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无奈形势瞬息万变……

参与1975年整顿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初，邓开始代生病的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就在邓小平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前，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把持，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文化部，体委，北大，清华两校，辽宁和上海两地等都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邓小平正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工作，他知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同“四人帮”抢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即出席1月5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

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计，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妥协。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从另外两件事情也能看出来。第一件事是，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毛泽东，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这次谈



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

吧。邓小平说的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另外一件事是，胡乔木在去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之前，正在组织几个“隐士”编学习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材料，胡乔木出了一批题目。参加者有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人。最后编成一本《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后因政研室成立，就未继续进行下去了。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政研室做的事情主要有4方面：第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和李鑫主要负责这方面的编辑工作。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毛泽东一篇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进行编辑，当然邓小平选择这篇文章是为治理整顿提供理论支持的。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这份稿子非常满意。7月13日邓小平上报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

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等于就此搁浅了。据邓力群回忆：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胡乔木和李鑫争论得很厉害。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少一点，保持原貌。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政研室成立后，开始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时毛泽东也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试图调整文艺政策。政研室收集的材料有：上送“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和《海霞》主创人员给毛泽东的信，得到毛泽东关于这两部影片放映的批示。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使鲁迅著作和小说《李自成》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泽东的信，使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如期举行。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泽东。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胡乔木转邓小平，然后转毛泽东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段时间，“四人帮”基本处于劣势。9月中旬，政研室围绕评《水浒》与“四人帮”进行了一次斗争。“四人帮”借毛泽东评《水浒》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江青在大寨大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遭到毛泽东批评。

第三，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政研室7个负责人中，胡绳分管学部。胡乔木给国务院打报告调了一些人手，组成了学部党组。胡乔木还专门给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谈《思想战线》怎么办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目前报刊上丢掉了毛泽东三项指示中的“安定团结”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杂志要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由于形势的恶化，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等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杂志。所以该杂志一直没有出来。

（张成洁 炎黄春秋 2015年3期 待续）